

邓广铭宋史人物书系



北宋 政治改革家 王安石

邓广铭 著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邓广铭宋史人物书系

北宋政治改革家
王安石

邓广铭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07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著作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 邓广铭著. — 北京: 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07.3

(邓广铭宋史人物书系)

ISBN 978-7-108-02648-4

I. 北… II. 邓… III. 王安石 (1021~1086) — 传记
IV. K827=44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025474 号

责任编辑 孙晓林

装帧设计 宁成春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7 年 3 月北京第 1 版

2007 年 3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9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 10.375

字 数 260 千字 图片 4 幅

印 数 0,001—8,000 册

定 价 21.00 元



1995年作者在北京大学朗润园十公寓



王安石

这幅画像是北宋崇宁五年(1106)抚州府修建王安石祠堂时绘制的,在明清两代还一直保存在祠堂里或王安石后裔的家中。很可能,这就是王安石退休金陵期内,李公麟为他作的那幅“著帽束带”的画像的一个摹本。

臨川先生文集卷第一

古詩

元豐行示德逢

後元豐行

夜夢和甫別因寄純甫

純甫出輝東崇書要子作詩

徐熙花

燕侍郎山水

陶鎮筆

逆沈氏妹于白鷺洲遇雪作詩寄天陽

招約之職方并示正甫書記

同王瘠賢良賦龜

《臨川文集》書影

宋紹興二十一年兩浙西路轉運司
王鉅刻元明逆修本，國家圖書館藏

本朝百年無事劄子

臣前蒙 陛下問及本朝所以享國百年天下無事
之故臣以淺陋誤承 聖問迫於日昃不敢久留語
不及悉遂辭而退竊惟念 聖問及此天下之福而
臣遂無一言之獻非近臣所以事君之義故敢昧冒
而粗有所陳伏惟 太祖躬上智獨見之明而周知
人物之情偽指揮付託必盡其材變置施設必當其
務故能駕馭將帥訓齊士卒外以扞夷狄內以平
國於是除苛賦止虐刑廢強橫之藩鎮誅貪殘之官
吏躬以簡儉為天下先其於出政發令之間一以謙
利元元為事 太宗承之以聰武 真宗守之以謙
仁以至 仁宗 英宗無有逸德此所以享國百年

十萬億那由其他國修造了三千諸菩薩萬億那由他諸佛
爾時觀世音菩薩即從座起頂禮佛足而白佛言世尊憶念本誓無
教恒河沙劫於時不律生現於世名觀世音利於彼佛發願誓現
彼律利於世間是修三摩地初於閻闍中入流至所入既寂重
靜三昧了然生如是勝妙聞所聞盡覺聞不住覺一以悅念
實覺極國心所常滅滅滅滅滅現前忽然超越世世世間十
萬國明獲三寶隨著上合十諸佛本妙覺三摩地乘因三摩
者下后十萬劫道眾生與諸眾生同一慈心世尊由利儀養利
喜如來常如來摩訶牟尼肉重聞修三摩地三昧與佛如來同慈力
於今升身成三十二應入諸國五世並昇其諸聖三摩地進修
禪勝解國升現佛身而為說法今其解脫若諸不覺坐靜妙
明勝妙現國利於彼無現獨覺身而為說法今其解脫若諸
有眼若利十層深覺勝勝性勝妙現國利於彼無現獨覺
身而為說法今其解脫若諸有眼若利四諦若修道入滅勝性
現其勝性現身而為說法今其解脫若諸眾生欲心明悟
代其覺身清淨我於彼現梵王身而為說法今其說法若
諸眾生願者之主統領諸天神於彼現帝釋身而為說法今
成就諸眾生願身自在遊行十方我於彼現自在天身而為
說法今其成就若諸眾生欲身自在飛行虛空我於彼現自在
在天身而為說法今其成就若諸眾生受諸偏思神教護國主
於彼現天大將摩身而為說法今其成就若諸眾生受諸
世界保護眾生我於彼現四天王身而為說法今其成就若
諸眾生蒙生示教驅使鬼神我於彼現四天王國太子身而為
說法今其成就若諸眾生樂者之主我於彼現全身而為說法
其成就若諸眾生受主諸姓世間推尊我於彼現帝釋身而
為說法今其成就若諸眾生欲名三摩淨身自居我於彼現
十身而為說法今其成就若諸眾生受治國王利此印色我於
彼現淨月身而為說法今其成就若諸眾生受諸勝教
衛自居我於彼現婆羅門身而為說法今其成就若諸有男
性出家持諸戒律我於彼現比丘身而為說法今其成就若
有女子妙學出家持諸戒律我於彼現比丘身而為說法今
成就若諸有男子學持五戒我於彼現優婆塞身而為說法今
其成就若諸有女學持五戒我於彼現女居士身而為說法
今婦不家而為說法今其成就若諸有男懷男根我於彼現
男身而為說法今其成就若諸有女懷女根我於彼現女身
於彼現童女身而為說法今其成就若諸有諸不樂出天倫
現不身而為說法今其成就若諸有諸不樂出天倫我現龍
而為說法今其成就若諸有善文學產婆我於彼現產婆
而為說法今其成就若諸有善文學產婆我於彼現產婆

序 言

一

我现在刚刚把那本撰写于 70 年代的《王安石》的修改工作进行完毕。这次修改的幅度是比较大的。

这次之所以对《王安石》进行大幅度的修改，虽有不少原因，但其中比较重要的原因之一，则是因为，在近十多年来内，我一直置身于改革开放的宏观政治气氛之中，经历了思想战线上的一次拨乱反正的大辩论，更加明确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治国、治事、治学、治史的正确导向；而随时随地出现在神州大地上的“改革是解放生产力”的万千现实事例，更使我受到启发，加深了对王安石发动于 11 世纪的变法革新事业的理解和认识。

我当然知道，王安石发动于九百年前的那场变法革新政治运动，是不可能、也不应当与当前的改革开放相提并论的，也不能把二者进行任何类比和比附。但是，如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说：“人体解剖对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反而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我重写此书的道理也正在于此。我是从现实政治经济的飞腾活跃的改革场景的体认，得到了启发，加深了对于王安石变法革新这一重大历史事件的理解和认识，从而产生了要重新改写《王安石》一书的意念。

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1年，我就写过一本取名为《王安石》的小册子，开宗明义，我突出地提出了他所主张的“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流俗之言不足恤”三原则，以为这虽是由司马光、范镇等保守派人物首先揭发出来的，实际上却是最真切的对王安石的传神写照。1972年9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访华。据说，当他到南海去拜会毛泽东主席时，毛泽东称赞他说，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日本历届首相全都反华，而田中却要来与我国恢复邦交正常化，这颇有似于宋朝宰相王安石的“祖宗不足法”的精神；又说，当时的美帝、苏修正阴谋合力对付中国，必然对田中的访华不予赞同，而田中竟能不予理睬，毅然来华，这又颇似王安石的“流俗之言不足恤”的精神。这次的谈话传出之后，人民出版社即来人与我商谈，要我把50年代初所写那本小册子尽速稍加修改，最好争取在1972年底即能出书。我却以为，那本小册子乃二十多年前所作，要重印，必须作大幅度的修改才行，于是商定于一年之后交稿，我也的确按照预定时间交了稿。但当时全国的学术文化界，却正上演着“儒法斗争”和“批林批孔”这两种闹剧，当出版社依照当时的惯例，首先印出了百来本讨论稿，送到有关大学和研究机构进行讨论时，所收集到的意见，却几乎是众口一词：对于“儒法斗争”和“批林批孔”的反映都很不够，亦即很缺乏“时代气息”。责编先生且为此而从上海的报刊上剪来几篇有关的社论交给我，供我进行修改时参考。为求书稿能够出版，我自不能传承王安石的“流俗之言不足恤”那种精神，而是按照从各处讨论会上收集来的意见，把全书做了一番修改。审查通过之后，到1975年5月才得以出版。可是，到“四人帮”被粉碎之后，出版社要重印此书时，提出要我加以删削和修改的，却正是以前要我补入的有关儒法斗争和批林批孔的“富有时代气息”的那些文句和段落。

当那本《王安石》再版出书之后，香港一家报纸刊出了一篇简短的书评，题为《邓广铭三写王安石》，对于我的那本著述，有

所称赞，也有所批评。对批评者提出的一些意见，基本上我都是同意的。此事过去已将近二十年了。我现在却要在垂暮之年，主动地来四写王安石。在写作过程中，我越来越感觉到，这次的重写，不但并非多余，而且十分必要。理由如下：

在70年代曾两次印行的那本《王安石》（印数达九万五千余册），其中所掺入的有关“儒法斗争”和“批林批孔”的污染因素，应当继续加以清除，这固然也可以作为这次重写的理由之一，然而更重要的原因却还另有所在。

王安石可以被称为诗人、文学家、学者、思想家、政治家或政治改革家，而我在过去三写王安石，以及这次四写王安石时，所要着重加以表述和描绘的，则一直是选取了他作为政治改革家的一面。

王安石是一个具有高尚品格的人，是一个杰出的政治改革家。对于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的变革他都具有理想和抱负、韬略和办法。宋哲宗即位之初，做中书舍人的苏轼，在《王安石赠太傅制》中，说他“名高一时，学贯千载；智足以达其道，辩足以行其言；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用能于期岁之间，靡然变天下之俗”。这等于说，用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标准来衡量，王安石的生平行谊，不但全都符合，而且到达了极高的境界。这些语句，尽管是依照司马光致吕公著函中所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为基调的，可是，在苏轼加以升华之后，格局境界却大不相同了。但与王安石的生平业绩相比照，却还是属于实事求是，而并无溢美拔高之处。所可惜者，这一次极公允的评价，在其发布之后，却一直被湮没在出现于它以前和以后的、大量带有诬蔑和诽谤性的记述和议论当中，从而未能引起当时以及后代人的特别注意。特别是蔡京与宋徽宗假借推行新法的名义而放僻邪侈、祸国殃民、无所不为，并在蔡京策划下树立了“元祐党籍碑”，致使新旧两派更势成水火，而蔡京与宋徽宗的种种罪

恶行径，终致使北宋政权为南侵的女真铁骑所覆灭。但蔡京势焰薰灼之日，在他所提拔的一群福建人中，也有保守派人物的徒众，例如杨时就是从学于程颢、程颐的人。这些受过蔡京恩惠的人，对于蔡京的一些祸国殃民行径，虽也有时形诸奏章，进行论劾，但在另一方面，也总要设法稍加开脱，于是就用推本求源之计，认为王安石是变法改制的始作俑者，遂把天下之恶皆归之于他。杨时在宋钦宗即位后，就曾上疏说：

蔡京用事二十余年，蠹国害民，几危宗社，人所切齿，而论其罪者莫知其所本也。蔡京以继述神宗为名，实挟王安石以图身利，……今日之祸，实安石有以启之。谨按：安石挟管商之术，饰六艺以文奸言，变乱祖宗法度。当时司马光已言其为害当见于数十年之后。今日之事，若合符契。^①

请看，杨时在《疏》中并未举出任何事实为证，而只是根据司马光的一句预言，就把蔡京的一切罪行都转嫁到王安石身上了。

福建崇安县的胡安国，他的仕进虽全与蔡京无关，但程门的高弟杨时、游酢等人都是他的好友。他对王安石之不列《春秋》于学官，竟也指斥为“乱伦灭理。用夏变夷，殆由乎此”。这里的所谓“用夏变夷”，当即指女真兵马侵据中原，颠覆了北宋政权而言。

在杨时、胡安国诸人大倡王安石的新法新学为北宋灭亡的祸端之后，南宋一代的知识分子几乎无人敢持异议，遂使此说成了定论。一些博学多识的学者，如南宋的朱熹、吕祖谦，清初的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也都不免接受这一定论，甚至更加以阐发。及至一些古文选本，如《古文观止》之类流行于世，凡读过几年村塾的人，几乎全是从北宋末年邵伯温冒苏洵之名，专以诋毁王安石为目

① 《宋史·杨时传》。

的而撰写的《辨奸论》中知道和认识王安石其人的，故王安石在这些人的脑海中，是一个极其丑恶的人物，自更不问可知。在清代前期，虽有两个江西人，李绂和蔡上翔，立志为其乡贤王安石辩诬，为此而写了专题论文和书册，但因他们所见有关北宋的史书太少（《续资治通鉴长编》和《宋会要》的辑本，他们都未及见），对于整个熙宁、元丰年间（1068～1085）以及其后的哲宗、徽宗两朝新旧两派的斗争实况，便不可能有充分的了解。更因蔡上翔乃是一个文人而非史家，他竟不承认司马光与王安石在政治上乃势不两立的敌人，自难做出实事求是的考证。梁启超于清朝晚年戊戌（1898）变法失败之后所写《中国六大政治家》中之《王荆公》，则是全从蔡上翔的《王荆公年谱考略》脱化而来，既未再作新的考索，自也不可能提出新的意见。在梁书刊印之后，虽还有继起评述王安石的著作，如柯昌颐的《王安石评传》等，更属“自郅以下”，不足置论了。在50年代后期，上海人民出版社印行了漆侠教授的《王安石变法》一书，对于熙宁新法进行了认真的探索，超越了前此所有的同类著述，似乎可以说已使王安石的变法得到了平反。但他对于实际作为变法精神支柱的“三不足”原则，处理得却仍嫌含混：他既以为“三不足”之说纯粹是反对派所造的谣言，已被王安石在神宗面前加以否认；却又以为，这个谣言颇符合于王安石的为人；在其叙述推行新法的全部过程当中，也并无一处把它与“三不足”原则搭上关系。用《春秋》责备贤者的书写笔法，我们似乎不妨说，对于驱动王安石变法改制的核心力量，亦即对于王安石厉行变法改制的思想、心态中最为本质的东西，漆侠教授把握得也还不够准确。

二

倾泻在王安石身上的污泥浊水、以莫须有的罪状来丑化王安

石的种种谤言谤语、虚枉记载，以及对王安石的一些高超言论和卓越业绩的歪曲湮没，始自王安石生前，到南宋而愈演愈烈，其后经俗儒村夫递相传承，迄今几近千年而未得昭雪。我现在虽是“四写王安石”，而在写作的进程当中，为求清除所有积淀深厚的污染，改变千百年来所铸成的对王安石的那些传统成见，恢复王安石的本来面目，我竟也经常产生“发潜德之幽光”的感觉。事情很明显，我希图在这本书中展现出来的恢复了本来面目的王安石，其形象与精神风貌大有区别于被严重丑化了近千年之久的那个王安石，对一般人来说，几乎都可以说是一个陌生的人物。因此，我必须牢牢依照“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的原则，以求具有足够的说服力。特别是，为求说服那些人，他们在理财观点上，迄今还信奉着司马光的那套理论，以为“天地所生，财货万物，止有此数，不在民间，则在公家”，因而仍然认为，王安石所说的能使“民不加赋而国用饶”的“善理财者”只是一种欺人之谈；而贯穿于王安石的新法中的所谓理财之法，除了加重对纳税户的剥削而外，也无他术。生于20世纪末叶的中国，面对着以解放生产力为社会经济改革主要目标的现实景象，竟还不能使自己的顽固思想得到开化、启发和解放，这充分说明，到目前为止，他们还只是以成见，而不是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我认为，要说服他们的唯一办法，终究还须依凭王安石在政治、经济诸方面的实践效验来进行论证。因此，在本书的各个章节中，我只是不惮烦琐、不惮重复地，援引王安石自己发表的一些言论，亲身策划的一些作为，独立构成的各种局势，力求以此种种因素展现出那个颇具特色的熙宁变法改制时期。其目的，也只是想凸现出一个抖落所有污染、误解和扭曲的政治改革家，使其能够以本来的风度和丰采，再现在读者的面前。

三

在史料的运用方面，我力求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在对史事的剖析和判断方面，我也是力求能够由表及里（亦即深度）、由此及彼（避免片面性）。在我四写王安石的实践过程当中，对于王安石的人格和业绩、气度和胆识的体认，全都有了某种程度的深化和提高。

王安石是生活在11世纪中叶的人物，但他的一些思想的卓越高明，远远超出了当时一般知识阶层的人群之上，却是极为明显的。即如他的那个“三不足”的思想境界，换用现代语言来说，实际就是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这使他成为当时思想界的先进人物，但同时也使他成为一个脱离了广大的知识阶层的人物。他虽极想用自己所撰作的《〈洪范〉传》中对天人感应旧说的纠正，能对宋神宗有所启发，使其对天变不足畏的观点能有所认同，但后来变法改制的实践证明，这对宋神宗并未起到些许作用。所以，在熙宁六年（1073）冬到七年春的长期旱灾情况下，宋神宗便不能不屈服于保守派人物的鼓噪之下，而导致了王安石的第一次罢相。

王安石是一个战略家。不论在政治、经济和社会方面，或是对待一直威胁着北宋政权安全的北方契丹政权和西北方西夏政权，王安石都有经过他的独立思考和深思熟虑而构成的规划和筹策，所以是一个真正的能够高瞻远瞩的战略家。

到三写王安石时，我还只是在《爱国主义的主张和实践》这一标题之下，述写了他的有关要兼并契丹和西夏的一些言论。这次改写，我又把王安石有关这方面的一些议论更多地引述出来，并改换为《王安石统一中国（亦即恢复汉唐旧境）的战略设想》的标题。据我暗自估测，翻看这本传记的读者，必会有人感到惊异，认为，自宋太宗到宋仁宗，不论对契丹或对西夏的作战能力，都已出现了“积弱”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还提出吞灭契丹、西夏的建

议，那只能是一种梦幻语言。然而我却以为，在此必须特别加以重视的是，王安石对从宋太宗以来，在对外作战时的战略决策，例如将从中御，例如颁布锦囊妙计以限制前线将帅随机应变的主动措施，以及不肯拔擢智勇双全、而只肯用傅潜那样的庸人担任统帅的职务，等等，是全都加以否定，要彻底加以改革的。在王安石全力支持的王韶征讨河湟之战过程中，他把前线军事的指挥之权，全听王韶自作主张，不在开封做任何形式的遥控。这也果然成为王韶取得战争胜利的重要原因。不妨说，这也正是王安石在用兵方略上进行改革的初次实验。这次初步实验的成功，也预示着王安石的整个战略设想之具有可行性与可能性。在《晋书》上曾记有一事：继承了西晋残破局势而在建康重建的东晋政权，内部掌握军政实权的人物，先之以王敦的兴兵造反，继之以桓温以别有用心的北伐而招致了枋头（在今河南浚县境内）的惨败，东晋军事实力确已不振，而在十五年后，面临前秦苻坚率领投鞭可以断流的南侵兵马之际，东晋的主持军政之人，却正是一位具有胆识的谢安，在他的镇定筹策之下，出兵迎击。淝水之战获得全胜，把苻坚大军打得土崩瓦解，丧魂失魄，甚至惊吓得发生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错觉。以此为证，可知决不应根据王安石当政以前，北宋王朝在对付契丹、西夏作战历史的种种失误，而断言王安石的这一宏伟战略设想，只是一种梦幻式的狂想而不可能付诸实施。至于说，王安石的这种设想，虽再三再四地见诸他的言论，却始终没有引起任何人的，包括宋神宗那样极关重要人物的同意，这却只能说，那是由于传统势力和失败主义思潮还都十分强大，而并非因为在理性的分析与客观的形势上全都不合时宜之故。我觉得，在这里还有必要提出的是，以北宋的王安石与东晋的谢安石相比，不论在对军国大事的企划和筹策方面，或是在实施时的务实和认真负责方面，谢安石是远远不能与王安石相比拟的。所以我在本书中还是着重地把王安石的这一战略设想标举了出来。

四

大发思古之幽情，导引听课学生去神游古国，这是我曾经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上受到过的批判，我也曾在狂风暴雨的形势下就这些事做过自我检查。然而，平心静气地说来，如果根本不具备思古之幽情，根本就没有神游古国的兴趣，那又怎么能够踏入历史学科这一研究领域，怎么能够去撰作历史人物，特别是像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这样一些历史人物的传记呢？

在我头脑中所保存的所谓思古之幽情，所谓神游古国，当然不是一种复古主义，把中国历史上的某个时期，认作最符合我的理想的时期，而是要尽可能既深且透地认识历史上某个阶段的政治经济、社会风俗以及文化、学术、思想诸领域的发展情况。为了写好政治改革家王安石的传记，我更得致力于 11 世纪中后期的有关上述诸方面的体察和了解。对于和王安石同时或先后活动于政治舞台上的一些人物，我也分别进行了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并与王安石的为人和为政进行一些必要的比较。

不论就 11 世纪中后期北宋、契丹、西夏三政权鼎峙的军政格局来探索，还是就北宋政权本身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方面的现实情况来探索，我所得出的结论都是，王安石关于变法改制的全部构想，可以说都是合乎时势之发展趋向，应乎民众解除患苦的迫切需求的。因此，这一构想之最后全被推翻，终究还得算作发生在不合道理，从而令人难于理解的一股历史逆流中的一桩历史事件。而造成这股历史逆流的最主要人物则是司马光。

曾经参预过范仲淹发动的庆历新政的富弼、韩琦，到宋神宗继位初年，全已是元老重臣，也全都已暮气沉沉，萎靡不振。富弼的政治见解，全都是属于鼠目寸光之类，而他的阶级斗争意识却特别强烈，凡遇政治上偶有违犯“率由旧章”这一原则的举措，他必

立即发生农民将会群起反抗的警觉。因此，他作宰相时总是终日拘拘束束地拱手无为。应当说，他是一个极为无智勇、无才能的庸流。韩琦则是仁宗、英宗两代的顾命大臣，但在处理军国大计上，也是一个缺乏谋略的人，当契丹无故对北宋进行挑衅时，他竟建议说把防御契丹的一切边备和防御设施一律撤销、拆除，契丹自然会无事了。可见他虽然被欧阳修在《昼锦堂记》中称颂为“临大事，决大议，垂绅正笏，不动声色，而措天下于泰山之安，可谓社稷之臣”的人，其谋国才能却也实在不值得恭维。保守派中头脑最为固执的司马光，他的年岁比韩琦、富弼都小（他只比王安石大两岁），在宋神宗于元丰八年（1085）去世时，他便以保守派的代表人物而被神宗的母亲高氏起用为当政的首辅了。

司马光主编的《资治通鉴》，是他用了十几年的时间编撰而成的，是一部比较好的编年体历史著作，通过编撰这一部史学巨著，他本应能够接受历史发展的许多有益启示，拓展自己的胸襟和眼界，事实却并不如此。他竟不承认时代的递嬗会造成事物的演变，在任何时候和任何情况下，他都是主张循守旧规，安于现状，反对进行任何改革的人。所以，从熙宁初年以来，对于王安石所制定推行的新法，他无时无地不力加反对。到他登上相位之日，依恃着太皇太后高氏的威势，竟凶莽灭裂地要把新法一律推翻。保守派中的同僚，有不少人分别向他进言，主张这种或那种新法应予保留，他却一概置之不理，一意孤行。单为争论役法一事，他竟被章惇质问得理屈词穷，章惇虽因态度和语言之粗率而遭受贬斥，但就事论事，无人不把章惇认作那场争辩的赢家。王安石为维护新法而与保守派人物论战时，每次都是以理据之充分战胜对方，司马光掌权后则全凭威势行事而蛮不讲理。因此，上台不久，即因其倔强不通事理而被人称为“司马牛”。

除了推翻新法之外，司马光还做了一件有辱国体的事，即把元丰中经沈括、种谔奋战，从西夏人手中收复的米脂、浮图、葭